

達德研究文集

香港立法學院校友會編繪

紀念建校四十五周年專号



達德學院建校四十五週年紀念



德馨

子羽

序





閩海有限公司

FUJIAN OCEAN CO., LTD

祝 賀

香港達德學院建校

四 十 五 周 年



華閩旅遊有限公司

HUA MIN TOURISM CO., LTD.

祝 賀

香港達德學院建校

四 十 五 周 年



香港 **中旅** (集團) 有限公司

China Travel Service (Holdings) Hong Kong Ltd.

香 港 **中國旅行社** 有 限 公 司

China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Ltd. 牌照號碼：350273

祝 賀

香港达德学院建校

四 十 五 周 年

祝 賀

香港达德学院建校

四 十 五 周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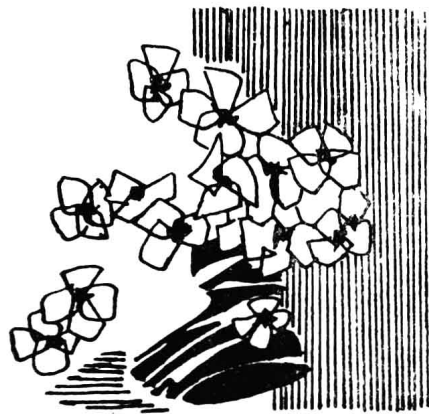
香港厦铃有限公司 賀

祝 贺

香 港 达 德 学 院 建 校

四 十 五 周 年

香港康祥旅游公司 贺





《达德研究文集》第二辑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在此之前，有劳大家久盼，十分抱歉。

和第一辑文集一样，又承蒙陈大中同志于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本辑的全部稿件作了认真的校审和工作上的热情指导，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对于师友们的踊跃赐稿，协助组约稿件，以及积极的建议和热心支持与鼓励，我们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年十月十日，正是母校建校四十五周年纪念的喜庆日子，为此，本辑特以“建校四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为主要内容，以示庆祝。饮水思源，我们又深深感念党对母校的正确领导，谨以此作为向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一份献礼，谨表永志不忘之忱。同时，我们又亲切地感受到：母校办学精神难忘，春风化雨的师恩难忘，同窗友好的情谊难忘，所以又在“忆念”这一栏中适当增大一些篇幅，藉托无限忆念之情思和加重纪念的意义。本此，我们愿以同样的心情，向我们敬爱的已故的老师和校友敬志最亲切的悼念，向在安度晚年以及仍然战斗在各个岗位的老师 and 校友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愿大家健康长寿，晚节溢芳，万事如意。

岁月不待人。我们的老师和校友，多半

是年事已高的人，犹能如此踊跃来稿，多不容易，多么可贵，这是多么热情的支持和鼓舞！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来稿都收进文集，但由于篇幅有限，又不能不违心地忍痛割爱，实在抱歉，敬请鉴谅。

近来旧体诗有颇呈繁荣之势，这是“双百”方针下的又一可喜景象，也是时代优迁所赋予的又一宠儿。从校友们寄来的诗稿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就把“诗词之页”这一栏办得“热闹”些，以不负大家这一盛情和雅兴。至于这些旧体诗的声律音韵，是否都无懈可击，那倒不敢为贤者諱。但其中究竟有无是出于直抒胸臆而不苟拘于格律而害意？抑或是为谋求创新而作探索的尝试？我们水平有限，不敢妄下雌黄。郭沫若老师在他所著的《洪波曲·南京印象》中就有“诗是见仁见智的东西，尤其是旧诗”的说法。再说，如果这些旧诗还有些不够成熟之处，但其格调如能与时代主旋律合拍，而又不乏诗情诗味，想也能为聪明的读者所接受的。

最后，还须多带一笔的是，有的校友提出所有文章的作者，还是用当年在学时的真实姓名为好，可以藉以寻踪觅迹，引起更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也尽力照办了。再次表示感谢。

达德研究文集

第二辑

目 录

· 编者的话 ·

· 建校四十五周年纪念专辑 ·

陈其璵 新岁新努力…………… (1)

邓初民 九十述怀…………… (3)

廖 钺 达德赋…………… (2)

林鹏等 南方革命的熔炉
——达德学院…………… (28)

谢一锋 母校建校四十五周年述怀 (诗)…………… (35)

谢同健 陈其璵与达德学院及其他…………… (34)

朱崇山 为了新中国
——访达德学院旧址…………… (36)

高 山 我的母校
——达德学院…………… (38)

谢一锋 试谈达德学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为母校建校四十五周年而作…………… (40)

庄文华 香港达德学院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 (51)

· 论述 ·

廖 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社会的变动与发展…………… (56)

筱庆 方冬 要为华侨树碑立传
——访归华学者廖钺…………… (65)

张其华	在陈嘉庚身边十年·····	(69)
-----	---------------	--------

· 忆念 ·

彭易卢	杨东莼先生二、三事·····	(75)
邓小初	追求真理 献身人民 ——怀念我的父亲邓初民·····	(77)
游 道	传播马列 矢志不渝 ——纪念邓初民老师诞辰一百周年·····	(80)
赵克盾	邓初老·····	(82)
侯外庐	学习翦伯赞同志求新求实精神·····	(84)
张传玺、杨济安	翦伯赞传略·····	(87)
董辅初	学习许涤新同志的治学精神·····	(99)
方 行	悼念许涤新 同 志·····	(100)
赵克盾	达德学院教授印象记 ——海滨 杂 拾之七·····	(102)
陈文治	我们再也无缘见面了 ——怀念邓初民、梅龚彬、沈志远、狄超白 老 师·····	(104)
张寿颐	忆达德学院的几位 老 师·····	(108)
波 涛	忠诚的战士 敬爱的老师 ——深切悼念周钢鸣 同 志·····	(111)
高任安	四度留港的 夏 衍·····	(112)
宁裕祥	龙明勋走向进步的 事 迹·····	(114)
黄秋耘	我所认识的钟敬文 老 师·····	(116)
张克朗	一位难忘的校外老师 ——怀念焦敏之 教 授·····	(118)
刘 汉	革命摇篮话 青 山·····	(120)
赵烈安	四十年前“南方革命摇篮” ——香 港 达德学院生活片断·····	(121)

赵克盾	达德学院的晚会	
	——海滨杂拾之十二	(123)
王启山	赵克盾同志小传	(124)
林东海	我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以后	(125)
李忠恕	香江的灯光——忆达德	(127)
庄文华	告别达德之后	(129)
刘益顺	南行求学漫记	(134)
孙士正	四十五年前旅港就学日记	(136)
杨济安	青山禅寺和屯门	(143)
张寿颐	悼念陈渊同志	(145)
蔡重明	悼念叶森玉同志	(149)
游道	悼念邵达明同志	(153)

· 随笔 ·

刘乐扬(孟南)	老师的《打油斋门外》选(五篇)	(154)
(一)孟南	索溪峪与岳阳楼碑刻	(154)
(二)孟南	满街都是诗人	(155)
(三)孟南	古典诗词的冷落与衰淡	(156)
(四)孟南	四言诗《答作诗要点》	(157)
(五)孟南	杜诗毛书笔误一解	(158)
廖钺	厦大长汀之忆	(160)
李忠恕	香港拾零	(163)
陈彻	学书两个月	(171)
林渊源	对比与再现	
	——一点英语教学心得	(172)

· 诗词之页 ·

张殊明 林林 钟敬文 莫乃群 金帆 廖钺 端木蕻良 王学仲
廖钺(《代序》、《后记》二篇) 俞百巍 吕毅子 张克朗 谢一锋

徐 白 黄振勋 詹奉玉 陈策斌 李任天 陈 渊 陈文治 丁 克	
陈 彻 林渊源 张寿颐.....	(174)

· 师生书信摘录 ·

刘乐扬 老 师 的 信.....	(212)
林伦彦 老 师 的 信.....	(213)
廖 钺 老师悼念陈渊同志 的 信.....	(213)
关于廖钺老师《橘颂》一诗 的 信.....	(214)
关于廖钺老师“德馨”题 字 的 信.....	(215)
廖 辽 校 友 的 信.....	(217)



新 岁 新 努 力

陈 其 瑗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这虽是句老话，却真正应了今年的元旦。旧快要除尽了，是万象更新的时候了。在古国的土地上，正被覆着融融的春光。当这新旧交替的时机，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无限兴奋。然而兴奋中不能有松懈。因为残余的冰雪，还阻滞着春的脚步。在复苏的原野上，还须要披荆斩棘，辛勤耕耘，才能期待丰茂的收获。我们正须更严肃、更沉着、更谨慎诚实地工作和学习，才能迎接到无限美妙的春。

两年半来，达德的努力不是白费的。正因为我们能够应着时代的要求，紧紧配合着现实的需要，所以能突破困难，不断发展。由于董事、同人、同学、工友的真诚合作，由于校外热心人士的赞助，我们已经打下了新教育的基础。我们建立了以院务委员会为首的民主集中、师生合作的行政制度；我们实行了课程的改革，使课程更合于学生的实际需要；我们在爱护学校整肃纪律的号召之下加强了同学的团结和提高了同学的自觉；我们适当地配合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以增加了学习的效率；我们正在建立正确的批评风气以保证师生团结与共同进步。在这些努力下，使本院学生人数增加到四百六十人；几乎达到了本院人力物力财力所可能支持的饱和点。我们每个人都要爱惜这个从艰难困苦中造成的结果。

“真才实学”是我们的目标。为了培养

的是真才，学的是实学，那么我们希望同学不仅能有除旧之才，并且有布新之才；不仅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并且能解决将来的问题，不仅有正确的思想，进步的理论，改革社会的方法，并且也有开辟和发展长期工作的知识能力。达德同学，单是懂得民主政治还不够，并且要有经济、行政、文化、教育各部门的业务知识和技术知识。局面越发展，这种人才越需要得迫切。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对这些学问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要学习使中国工业化各种技术知识。这可以作为今后学习方向的指南针。

要培养成一个真才实学的人，当然要花较多的时间，本院大多数同学，既然有条件也有需要在院内长期地学习，那么在教学的处理上，自然首先要适合于大多数同学的需要。然而所谓长期是相对的，以学问范围之广，实际需要之多，就是拿三年来学习，又何尝不是一个开始呢？所以我们的课程要做到精简现实，才能提高教学的效果。我们在这方面还须进一步地努力。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大，我们亦就越有能力照顾到少数，使没有条件长期读下去的同学，亦能尽可能地学到急需的东西。

为着达德的巩固与发展，我们必须提高



廖 钺

“德厚兴邦国，江河万古流”。（1）
德之为性乎福乐也；德之为品乎，善美也。
福兮，善兮！美兮，乐兮，德之义可谓大
矣，德之风可谓高矣。“有德则乐，乐则能
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2）
德能以致高，德能以远及。

达德，达德，人之所求，社会之所寄。
君子之达德兮，雍容为善，旷达自强；社会
之达德兮，宽松祥和，融融鼎兴。

为求达德兮，我校爱之；为求达德兮，
我校名之。置红楼于青湾，设杏坛于海湄；
聚全国之英才，集天下之贤士；招学子于五
湖四海，植桃李于南国芳园。博学鸿儒，群贤
毕至。究时代之新学，弘华夏之文光，弦歌
鼎沸，济济一堂；展新兴之教业，育俊秀为

栋梁。树岭南以一帜，迎东风而飘飏。吾校
之名播于五洲，吾校之德达于四方。

将经半纪之推移兮。实远久而葆其辉
煌。达德，达德，吾校之名永扬，吾校之德
日彰。吾侪秉达德之精神兮，启来兹，继恢
弘而发扬。

有诗赞曰：

忆昔当年聚一方，壮怀豪兴满画堂。
偏安一帜光华夏，史籍留芳万载长。

一九九一年六月

（注）①1988年广州越秀侨艺书画会访
顺德侨乡有小诗予赠的一首中二句。原诗：
“德厚兴邦国，江河万古流，不靠神仙赐，
新论展筹谋。”

②见《左传》“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时时要把握着此时此
地的主客观条件。我们不能超过了财力物力的
限制而妄求量的扩充，我们倒是要克服经济
上沉重的负担而求设备的充实，使同学们
生活得更合理，学习得更有效。我们应该了
解到师资的困难，因而要在“教师把功课教
好，学生把功课学好”的精神下，充分发挥
充分爱惜现在的教学力量，把它提高。局面
是在发展中，现实提起了许多迫切的要求，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些要求；但是我们在主

观上有多少能力，在客观环境方面有多少限
制，我们必须注意考虑的。在这里，我们有利
的学习条件是很多，我们都抱着为人民服
务的心，都爱民主爱真理，重科学重实
践，我们不为旧教育传统所束缚，敢于创造
敢于进步，这是国内一般大学所难于希望的
教学自由，所以我们应当配合客观环境的可
能与现实性的有利条件，才能把握时机发
挥主动力量，求得更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原载一九四九年元旦《达德青年》第5期）

九十述怀

邓初民 遗稿

原湖北政协史室编者按：邓初民同志的“九十述怀”，是他在病中口述的。由他的秘书吴伯就，学生杨起华同志记录整理。发表前曾征求吴、杨两同志的意见，并对一些史实作过核实工作；民盟中央有关同志和杨玉清先生曾给予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本室李振东同志对部分重要史实进行了核实和某些修改、补充。特此说明。

光阴荏苒，我已度过了九十一个春秋。记得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六十年牛马十年人》。我感到，只有深知旧社会的苦，才能真正体会出新社会的甜，才能更加热爱人民的新中国。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了，我非常感激党和人民，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对人民革命事业没有多少贡献的人，在工作和生活，都给了我极优厚的条件。特别是近年来，我已失去工作能力了，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一直得到医护同志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这样的幸福，在旧社会的六十年里，连想都没有想过啊！

自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我的视力和听觉都无可挽回的衰退了，体力已不允许我继续和同志们并肩战斗。当前，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的心，我的思想感情，总是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同我的许许多多的好同志、好朋友相连相通的。

近来，曾有几个方面的同志要我谈谈自己的经历，据说有的单位还发表了，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同志们，仍向我要这类资料。湖北是我的故乡，武汉地区是我在大革命时期最初接受党的直接领导，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也乐于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尽可能地讲得详尽一些。我所经历的年代，正是我们祖国翻天覆地变化极大的历史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最复杂最艰苦的条件下，最顽强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时期。所以作为我个人的事迹，是毋须多说了。但是，通过我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段历史的发展；反映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同国民党两度合作，又两度被分裂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了解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些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的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这些都是值得记载的。只因我的精力不够了，难于谈得详尽准确。遗漏和错误之处，尚请知情的同志们加以补充指正！

我准备着重地谈“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的经历和见闻。

（一）

先从我的家庭和少年时期的情况谈起。

我是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0日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江北一个偏僻的农

村里。祖父是个佃农。父亲在贫寒的家境中，勉强而又刻苦地读了几年书，后在家乡做塾师并当了中医。他在桑梓行医，不收诊费。所以我的家庭生活，一直极其困难。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黎明即起，忙了家务，还要下地干农活。母亲最疼爱我，对我管教也很严。记得有一次她要我到邻村借一把剃刀来给我剃头，我借到剃刀路过一个池塘时，好奇地捉到一只青蛙解剖。不料解剖完毕，匆促中再找不到剃刀了，只好空手回家扯谎说：“人家不肯借”。几天之后，来讨还剃刀的人揭穿了我的谎言，母亲非常气愤，顺手拿起一根竹棍，押我去池塘边寻找，边走边打，边对我进行教训。她认为：失落剃刀是一时疏忽，疏忽是可以原谅的，扯谎便是欺骗，欺骗是不能容忍的。她以劳动妇女的正直思想感情，对我进行了一次痛切的告诫，教育我从此要正确的立身处事。剃刀在草丛中找出来当即归还了原主，但是母亲的“竹棍教育”，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我不能忘怀。

我读书主要是靠父亲多方筹划的。从五岁起，就在既是严父又是严师的私塾里发蒙。三年一气读完了“四书”等几本书，虽然在文字上背诵得烂熟，但对内容根本不懂。当时私塾的教学，以孔孟之道为主导思想，而孔孟之徒是极力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所以听了不少“法先王”的故事。我在听这些故事中，对大禹治水的事迹感受最深。父亲要我读书的目的，并非做官发财、光宗耀祖，因而他在对我讲述这类故事时，也着重突出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这在我幼年的心灵中，立下了“舍己助人”的英雄形象。于是在我投考石首县高等小学时，便取名“希禹”。毕业后又考入荆南中学。

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正值康、梁企图以“变法”手段来挽救腐朽的清廷。经过帝党、后党之争，慈禧太后完全掌了实权。她倒行逆施，对帝国主义更加卑躬屈膝，连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对国内人民，则更加残酷地进行压榨，搞得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我的家乡，也和其它农村一样，冻死饿死者比比皆是，我的一个族兄就是活活饿死的。在这种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中，促使我思考着富国救民之道。

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在荆南中学，曾和同学们到校外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但也只是宣传，实际上怎样救国救民，如何进行革命，仍然是模糊的。

辛亥革命之初，在我思想上曾得到一时的振奋，以为国家可望从此好起来。我到武汉考入了新筹办的准备以宋教仁先生为校长的江汉大学。实际上宋教仁没有到职，学校也并未正式上课。但是校内有一个在辛亥革命战斗中失去一条腿的人，他自名“林一足”经常邀集同学宣传社会主义，散发社会发展史的书籍。这时我才知道：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依靠集体力量才能获得生存，而且收获物很少，平均分配之后没有什么剩余产品，这就形成了原始社会的共同生产、共同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我很向往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的人，所以又改名“初民”。

1912年，孙中山先生被迫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但国民党在国会议席中尚居多数，宋教仁想借此以“政党内阁”来制约袁世凯，1913年3月被袁密谋刺死于上海，江汉大学也就此停办了。辛亥革命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就被北洋军阀践踏了。事实告诉我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事实也促使我去进一步探讨革命的道理，于是下决心出国留学。但是，我家很穷，在国内读书已很不易，出国就更加困难了。幸而得到父亲的全力支持，他多方请

求亲友襄助，我在1913年5月东渡日本。

(二)

我是为追求革命真理而去日本的，所以投考了东京法政大学，但这是一所专收学费并不严格要求学生学习、在管教上也比较马虎的学校，要学到一点东西主要靠自修。此时，日本已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译著，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为了阅读这些书籍，我又在私立日文班专学日文。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了要做皇帝，竟同日本当局签订了“二十一条”。这个窃国大盗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忿慨。我们不顾日本当局的种种压制，立即掀起了反袁运动，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一位东北同学任总会会长，我任总会评议会会长；李大钊同志任总会文书干事，起草通电，连夜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现已载入李大钊选集）。接着李大钊同志和湖南留日学生总会经理易象同志（田汉的舅父）同我商量，决定出版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月刊，名叫《民彝》。李大钊、高一涵和我都是编委，李主编了第一期，高编了第二期，我编了第三期。这刊物的名字，是易象同志定的，意思是“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主要内容是反袁称帝。后来李大钊、高一涵两位回国，又因为这个刊物与日本当局的胃口不和被停刊。

我和李大钊同志在日本时，除了成立留日学生总会以外，还同一些被袁世凯解散而到日本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共同组织了一个“神州学会”，积极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讨论挽救国家危亡的方法。林伯渠同志当时是“神州学会”的会计。该会结束后，还印了一个会员通讯录。李大钊同志为了直接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回国当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又在北京办了一个周刊，要我经常写留日同学活动的通讯，每月给我一点稿费，勉强维持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不少进步朋友，对革命的道理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

(三)

我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后，于1917年和易象同志一起回国。在海船上获悉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消息，我们欢喜若狂，认为这就是中国要走的路，我们带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回到武汉，我认识了施洋律师。他热情似火，满身都是活力，要我留在武汉工作。但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我这个留日学生照例找不到一个吃饭的职业，只好回到老家。在家乡见到当地土豪劣绅依然横行霸道，欺压穷人，特别是见到骗卖妇女，非常气愤。我联合几个中学时的同学，揭露这类丑恶罪行，却遭到当地军队的蛮横干涉。我感到以一个穷途落魄的洋学生，同封建地主恶霸作孤军抗斗，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因此，又陷入苦闷、彷徨、挣扎之中。

1919年6月，忽然接到在山西的一位原“神州学会”的朋友的来信，说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邀我去教中国语文课。于是变卖了一些东西做路费，赶赴太原。

在去太原的途中，得知爆发了“五四”爱国青年运动，心想到太原后立即投入运动。但当我去见那位校长时，他竟然要我用日语同他谈话。这是始料不及的怪事。虽然我在日本曾用心学过日文，但并没有认真学说日语。这样，请我教中国语文的事就搞吹了，而且路费也用完了，困在一家小旅馆里。在这进退维谷的意外遭遇中，我写了一篇《旅晋一星期有感》的短文，投到山西日报发表了。事有凑巧，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看到报纸，派人找我去面谈，决定留我在太原，先住进山西省图书馆。随后，要我代他写一本参加辛亥革命的回忆录，每隔一段时间，就找我谈一次话。我就借此机会，在图书馆涉阅书报。

不久，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山西日报”派我当代表，我乘机去看望了李大钊同志。他的住所很简朴，一见面就说：“从前我们在日本办留日学生总会月刊的那位编辑，今后再见到时，不要同他多谈什么问题，因为他的思想很落后。”李大钊同志接着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热诚地指示我如何教育学生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工作。

阎锡山当时野心勃勃，在山西搞“门罗主义”，对外省的军阀混战，暂时保持中立，一心要闭关“自治”。他除了用“进山会议”等政治组织笼络上层人物之外，还大办学校，培养骨干。有一次阎锡山对我说：“你想当官可以做县长，想教书就去进山中学”。我说：“最喜欢住清水衙门”。我后来在山西的实际工作，就是在阎锡山办的“进山中学”和一所外语学校里教中国语文课。我就照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把主要精力用在教育青年、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工作方面了。当时山西省图书馆利用阎锡山的这种“开明”政治，大量购买新书刊，其中先后购有新译的马列著作，以及《新青年》、《响导》和由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等。我从中选一些政治论文作语文教材，向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很受欢迎。我除经常与进步师生往来，还到第一中学、第一师范等学校进行活动。我们还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并出版一个小型刊物《新觉悟》，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怎样改造中国》的文章，从社会发展史论断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一些进步同学，后来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并作出了贡献。张友渔同志就是当时极为热情积极的编辑之一。这当然是阎锡山所始料不及的。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在太原工作了五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带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之后，紧接着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贯彻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协商，孙中山先生接受了国共合作的条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在大会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确认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原则。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我得知这些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大消息时，感到无比的兴奋。特别是当我知道李大钊、毛泽东和林伯渠等同志不仅参加了国民党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之后，我决心回南方参加革命。当时虽然阎锡山把我待为上宾，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决心离开太原。恰好，湖北法政大学（校长张知本）聘我当教务长，我未经阎锡山的同意，就于1925年2月回到了武汉。

（四）

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里，我有幸在董必武同志的指引下，开始直接接受党的领导，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而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决心在党的旗帜下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

我到政法大学不久，董必武同志亲临教务长室，邀我参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他当时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负责我党在湖北地区的统战任务的，所以我极其高兴地答应了。之后，他先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接着又参加了一次秘密集会，按照国民党的新党章，改选省党部的执、监委员会。选举的执委和候补执委约二十人，我记得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其中有：董必武、吴德峰、钱介磐、蔡以忱、陈卫东、袁溥之、陈潭秋和他的爱人徐全直，以及李哲时（即现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李文宜同志），非共产党员有詹大悲、李汉俊、何羽道和我，还有孔庚、孙科等。李汉俊、何羽道和我被选为执委会常委，郭树勋（述申）为秘书长，吴德峰兼公安部长，李哲时是妇女部长，我先任青年部长后任宣传部长。

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是有生气的，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尽管北洋军阀政府仇视和镇压革命，但人民群众仍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天夜晚，陈潭秋同志特意到我家中作了一次长谈，我们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各个方面的看法完全一致，他最后征求我入党的意见。我当时仅考虑到自己有爱出头露面、夸夸其谈的缺点，这对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对一个地下党员来说是极不利的。所以我考虑了一阵之后，郑重地对陈潭秋同志说：“我感到还不具备入党的条件，我在党外工作，可能比在党内更为有利”。我向他表示，今后不管在什么困难的条件下，我坚决听从党的领导，按照党的路线行事。陈潭秋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在以后的行动中算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是，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错过了及时争取入党的机会。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兵分三路，开始北伐。其主要战场在两湖地区，因为北洋军阀中吴佩孚的主力盘踞在这里。当时的革命形势大好，群众痛恨北洋军阀，北伐军士气很高，沿途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约在七月中旬，一举占领了长沙。

此时吴佩孚调其精锐部队在湖北的汀泗桥、贺胜桥两处固守，企图顽抗。并宣布他亲往前线“坐镇”、“督战”。但是北伐军势如破竹，连陷敌阵。吴佩孚在前线亲斩几名败将，也无法挽救败局，只好狼狈逃窜。北伐军一鼓作气，于八月底直逼武昌城下。吴佩孚又严令其湖北督军陈嘉谟和第八军军长刘玉春死守城垣。他本人退据汉口，调兵遣将，仍图反扑。因武昌城防坚固，火力猛烈，北伐军连续攻城，均遭顿挫，乃改围困战术。约九月六日，由武昌上游抢渡长江的北伐军何键、夏斗寅两部，逼近汉阳，守敌吴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宣布起义，北伐军遂进入汉阳。组织上命我前往召开群众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和庆祝。吴佩孚闻风北逃，汉口也宣布光复。汉口光复后，董必武同志在汉口西商跑马场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会，湖北省党部即行公开活动。

这时，武昌城内的顽敌仍作困兽斗，对革命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学生领袖陈定一被杀害于孔庙前，并悬首示众；而陈潭秋同志等仍继续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奋不顾身地进行瓦解敌军的地下活动。直至10月10日，北伐军最后攻入武昌，生擒了陈嘉谟、刘玉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万众欢腾。